

《新青年》杂志与“白话”理论诞生

丁燕燕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透过《新青年》杂志追寻“白话”理论诞生、发展的历史印迹,可以发现初期“白话”理论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口语化倾向。白话话语系统在语用层面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的现代特征。它在词汇方面容纳了部分文言词汇又吸收了某些现代口语,在语法结构上借鉴了古代白话文学、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长,为达成白话体系语言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契合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新青年》;“白话”理论;工具性;词汇;语法结构

中图分类号: I 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6-0067-06

The Magazine of *New Youth* and the Theory of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DING Yan-yan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Having studied the magazine of *New Youth*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ernacular theory, we find that since it was born the vernacular theory has been equipped with distinct features which are instrumental, practical and colloquial. Granted that the colleagues of *New Youth* endeavored to advocate, explore and revise the theory, the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becomes a form of discourse which not only holds part of classical Chinese vocabulary and also assimilates the excellence of classical vernacular literature, new vernacular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modern spoken language.

Key words: *New Youth*; vernacular theory; instrumental; vocabulary; syntax structure

“五四”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最终使中国现代文学面貌发生了根本改观。“白话”理论包括语言工具与思想两个层面的内涵,“五四”文学革命因为“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的倡导

使语言潜层的思想本性备受关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新文学对文言体系的挑战最早恰恰发生在语言形式层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探寻“白话”理论诞生之初在语言工具

收稿日期:2013-10-26

作者简介:丁燕燕(1980-),女,山东日照人,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层面的发展历程。

一、初期“白话”理论的工具性、实用性与口语化特点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开启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大幕。因留学英美而开阔的理论视野使他得以用现代性眼光审视古典文学,从而发现了中国文学不得不变革的内在动因。在这篇带有标志意味的文章中胡适将文学变革概括为“八事”。其中的“三曰须讲求文法”、“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和“八曰不避俗语俗字”等“五事”都直指文学中的语言问题^[1]。古典文学的空虚浮华与文言形式的僵化泥古如出一辙,胡适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传统文学中文言形式对作品内容的影响,甚至在对第六条“不用典”的论证过程中已经触及到语言形式性与内容性的统一,但胡适仅止于感观描述,并没有在理论高度上对其加以整合。当他继续深入,正面分析“不避俗语俗字”这样的语言问题时,反而失去了高妙的理论敏锐度。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在胡适停留于语言工具层面的理论中归根结蒂都只是相对内容而言的一种“器”,白话由于是一种“利器”,能充分发挥语言的记录功能而被胡适看重。这样一来,由胡适开启的语言革命就为初期“白话”理论划定了语言工具论的方向,如果不考虑理论本身的偏颇,仅从文学史意义考察,它反而避重就轻地为五四文学变革找到了最易突破的关节点。

既然文字在“新青年”同人那里最初是被当作记录语言的工具来看待,那么工具的实用价值和功利特性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理论倡导者于是开始心无旁骛地探究白话理论工具性层面的种种细枝末节,充分发掘其语用功能。胡适强调白话的浅显易懂,陈独秀主张表情达意是文字的本义,刘半农则更为直白地认为文字就是记录工具,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精神内涵,真正

的涵义在于文字所记录的事物,“故作文字如记账”,只要老老实实在地把账目记清楚就可以了。文字的价值与意义取决于它们“所记之事物”^[2],与其自身无涉,这显然偏离了语言的主体性,仅仅停留在工具论层面展开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粗疏的论证方法使得“新青年”同人廓清了复杂的理论迷雾,针对文言文无法流畅地表情达意的工具性缺陷大加挞伐,有的放矢,成效显著。陈独秀就曾颇为笃定地断言:“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对白话存在的合理与合法性深信不疑,充满了理论自信,这种真理在握,舍我其谁的豪情不能不令人动容。

就语言直观可触的实用价值,胡适曾提出“死”文字与“活”文字两相对立的概念。他认为文字没有雅俗之分,但却可以有“死”、“活”之别,那些日常运用、具有现实应用价值的语言所形成的文字就是“活”文字,相反,凡是远离日常生活,失去应用价值的语言文字就是“死”文字,能否“日用”成为二者最重要的区别。为此,他还别出心裁地列举了几组“死”文字与“活”文字对立的例子,在调侃笑谈中确定了文言与白话的分立:“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字,今人叫号”……^[4]“悬梁”、“欲”、“字”等文字显然既缺少实用价值,也有别于日常用语,没有“上吊”、“要”、“号”等文字来得自然质朴。在文学革命初始阶段,怎样用最有效的手段将白话与文言的优劣辨析清楚,怎样用最简捷的方式为白话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是“新青年”同人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胡适这种“死”、“活”对立,反差鲜明的表述,活泼生动的论证形式无疑具有某种策略性。它深刻契合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有效地将白话与文言的对立转换为新与旧、今与古的对立,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今昔比照的时间观和以实用主义为旨归的价值判断标准。因为,“新”与“旧”是20

世纪中国涵义最丰富和暧昧的两个概念,“新”与中国知识界的现代主义焦虑一脉相承,是“现代”、“发达”、“进步”等正面价值的同义词,而“旧”则与掣肘古典中国走向现代的种种负面意义相关。白话在这种“死”、“活”概念的比照中就立刻显现出历史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与此同时,这种理念也将初期白话理论的发展引向了另一路向——白话的口语化。

“新青年”同人看重口语即时性、现场性、纯朴自然的风格,将其引入白话话语体系,从而使初期白话理论呈现出与口语体趋同的特色。因为,在“五四”文学变革初期,旧的文言体系已然不可延续,新的白话又正处雏形阶段,能够为全新的语言体系提供参照的话语形式并不多,加之当时人们要极力避免的主要是古典文学浮华虚弱的负面影响,处于应用当中的口语,用语简练,抒情自由,鲜活生动的原生态面貌自然成为了白话语言变革的方向。对此,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事”中“不避俗语俗字”的提倡发其端,钱玄同“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的见识承其绪^[5],而他“宁可失之于俗,不可失之于文”的看法更将这一革新倾向推向极致^[6]。因为与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亲缘性、贴近性,口语化的白话改革渐渐引发了普遍的社会关注,使人们的视点聚焦在白话应用层面即工具性的革新上。从《新青年》杂志一位读者对此的反应中可以想象当时普通民众对白话改革的认可程度。他阅读过《新青年》杂志,对白话理论进行整合后认为,白话文应该以通俗易懂为宜,多取简单晓畅之语,“凡不能代以俗语者,必力求其浅显”^[7]。“俗语”、“浅显”成为普通民众对认识白话的关键词,由此足可见,“新青年”同人对口语化白话的提倡已成深入人心之势。

二、初期“白话”理论在词汇层面的完善

在日常口语基础上形成的白话,强大的交流

沟通功能自不待言,但其指涉的思想内涵却有待开掘。毕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口语多以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为旨,直白、简易的词汇较多,缺少隽永的思想沉淀,不追求语言的风格韵致,只能基本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信息传递需要,却很难适用于细腻地抒发情志和描摹事物。或许因为事出仓促,“新青年”同人为了与文言体系难学、难懂、凌空蹈虚的缺点针锋相对,才重点强调白话理论的浅显和通俗,这显然属于一种单纯的权宜之计,难免带有哪疼医哪的局限性。虽然实用性、口语化的白话能够真切地模拟和再现人们的日常语言情景,有其难以企及的表达优势,但若想成为一种完善的语言体系,显然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词汇过于贫乏,辞气浮露、文无藏锋,语言涵盖的思想意蕴太过干枯单薄。

初期白话的这一缺陷导致了人们对白话可行性的误解,有人由此得出文学革命应该缓行的结论;也有人认为俗语俗字的大量引入使白话语言粗陋烦琐,失去了应有的魅力;还有人提出文学革命应该更稳健地推行,不可冒进涉险;更有甚至者,一些文学革命的反对者以此为借口攻击白话如鸟鸣兽语一般不可理喻。其中,尤以古文家林纾的概括最为典型,他不无嘲讽地指责道:“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啾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8]。如此愤愤然地诋毁白话,其根本动因是文学革命废掉了他钟爱的“古书”与文言,对文学革命持敌视态度的林纾自然“恨屋及乌”,对白话也恨之入骨。他有意将处于社会低层的“引车卖浆之徒”与土语、口语联系起来,希望用语言使用者身份的卑贱来贬损俗语、口语化的白话。这些来自各方面的责难一方面对本来就存在许多弱点、处于雏形阶段的白话理论伤害极大,另一方面也促使“新青年”同人主动反思白话理论的自足性。

文学革命初期,理论倡导者们因为侧重于语

言工具性功能的开掘,过于追求语言的浅显通俗,主张要建立全新的白话体系就应该完全舍弃文言,采用崭新的白话词汇,完全以土语、俗语、口语为白话改革的标本,泛滥、直白的词汇运用使白话淹没在浅露的口语流中无法自拔,显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为此,他们对文言文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人们发现,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区分是内在本性的不同,不在于个别、具体的词汇运用。并且,文言体系经过历代文人的精雕细刻,反复琢磨,已臻成熟境界。客观地讲,除去某些生硬刻板的陈词滥调,文言中确实有许多表达雅洁、蕴涵浑厚的词汇,它正可弥补白话话语词汇贫乏的不足。因此,白话体系完全可以吸收仍具活力的文言词汇来丰富自身,这样只会增强白话的语言表现力,而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作为现代新语言的本质属性。

胡适曾谨小慎微地表达过相似观点,他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对“白话”作了如下定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9]。“不妨”二字将胡适其时的矛盾心态表露无疑。一方面,胡适已经隐隐觉察出白话体系离不开对文言词汇的借用,所以主张,白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文言字眼;另一方面,他又对文言词汇向白话体系的渗透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生怕文言词汇的“夹入”会打破白话的纯粹性。这种进退失据、无所适从的心态既是激烈的文学革命的产物,同时也与“新青年”同人缺乏对语言思想本性的认识有关。白话作为全新的语言系统,其本质的规定性是包蕴了现代意识的思想内涵和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的统一,白话的现代性特质不会因几个文言词汇的出现而消退。只不过,胡适在文学革命初期对语言的认识还没有冲破工具论的局限,所以才会在文言词汇的选取问题上犹疑不决。倒是傅斯年这个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年轻人,快人快语,在《新青年》杂志的读

者论坛中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一语中的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年轻气盛的傅斯年少了些理论探讨的犹疑多了点任意而为的洒脱,他没有顾忌白话纯粹与否的问题,也不纠缠于语言深层本质的探究,而是从直观实际的语用角度切入,客观理性地考察文言和白话特点,澄清了社会对俗语、口语化白话的误解。他解释说:“废文词者,非举文词之用一括而尽之谓也。用白话者,非即以当今市语为已足,不加修饰,率而用之也”。接着傅斯年又从学理层面分别剖析了文言与白话的短长:文言“虽深芜废杂,已成陈死”,但经两千年发展,有其独特内涵,而白话“虽行于当世,恰合人情,”但毕竟还稍显贫乏、稚嫩。因此,要“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最后,傅斯年条分缕析地辨明文言与白话在各词类中的异同与优劣,逐一设定了词汇选择、取舍的标准,为“文言合一”制定了详实的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可操作性极强。他认为白话与文言在词类层面最主要的区别在虚词和代词,因为关系到语言属性的判别,所以要以保持白话特质为底线,这两类词要全取白话;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属于白话与文言能相互兼容的词类,选词的标准便不应拘泥于文白之争,而是以客观适用为依据:“文词所独具,白话所未有,文词能分别,白话所含混者,即不能曲徇白话,不采文言”,“白话之不足用,在于名词……至于动、静、疏、状,亦复有然。不足,斯以文词益之,无待踌躇也”;至于双音词因为能避免单音表意词汇容易出现的同音歧义现象,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应予以保留:“在白话用一字,而文词用二字者从文词”^[10]。这样一来,文言之别不再是白话体系选择词汇的生硬标准,就极大地扩充了白话体系的词汇量,增强了白话的语言表现力。(它当然还与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名词、新术语有关,因涉及思想文化等复杂问题,我将另文论述。)傅斯年规避了胡适等人探求白话本质特性的风险,只将论述的重点全部集中在白话体

系的语用层面,没有旁出斜逸的小论点干扰,目标突出,措施得当,比胡适那“黑白”、“清白”的模糊提法可行得多,也为此后“新青年”同人设计各种语言变革方案铺平了道路。

三、初期“白话”理论在语法结构层面的创见

五四文学革命初期,白话对文言的挑战可谓危机重重。在白话话语体系向文言开放,获得了丰富的词汇之后,还面临着语言结构变革即表达方式创新的问题。因为,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表达观念、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一种语言能够在社会中通行需要社会内部的人们共同接受并运用这种语言的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从而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集体习惯和行为意识。惟有如此,生活在语言体系中的人才能在统一规范的支配下运用语言,达成共识,交流沟通信息与情感。带有俗语化、口语化特色的白话体系显然存有杂乱、散漫、任意性强、头绪繁杂的缺陷,很难形成一种有法可依、稳定凝固的语法规则,从而严重阻碍了白话话语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与此相对,易于记录和保存的书面语反而具有结构稳定、逻辑性强的优势,在语法结构层面,白话语言体系完全可以从其中取法借鉴。

1917年启动的“国语运动”可谓恰逢其时,为白话理论语法结构层面的变革指引了方向。它主张“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11]。白话语言的应用价值既表现在“明白近文”的词汇上,也与“统一”可循的语法结构息息相关。“国语运动”的实质是尝试以某种书写语言作为国语基础,为语言的使用和流通制定统一标准,即“明白近文,字字可写”。这一思路无疑对完善白话语法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启示作用。白话如何从粗

鄙浅陋的口语化形态上升为涵盖精深思想、传达丰富情绪的语言体系不能不以书面语特别是文学作品的成熟为标志。这样一来,白话文就成为白话语言体系的核心和典范。陈独秀对此深有体会,“鄙意今日之通俗文学,亦不必急切限于今语。惟今后语求近于文,文求近于语,使日赴‘文言一致’之途”^[12]。陈独秀对“语求近于文,文求近于语”的提倡,就是要以书面语特别是文学语言的凝练蕴藉和内涵深厚作为白话改造的目标,同时又以白话的流畅自然、质朴平易矫正古典文学的浮华虚弱。胡适则直接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副题,写成《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为白话理论做了最好的理论总结。他将“国语”和“文学”作为互相参照的两大体系,主张在文学创作中修正、打磨、完善白话,反过来又在白话话语的逐步发展成熟中创新、丰富新文学,这不能不说是两全其美之策。当然,在白话文学创作还方兴未艾之际,已有的、可供白话进行语言学借鉴的文学样本是十分有限的。胡适青睐于古典白话文学,强调尽量采用《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中的白话词汇与语法。傅斯年则别求新声于异邦,讲究“直用西洋词法”。一中一西,一古一今,两人的主张将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与西方优秀文学经典悉数纳入白话理论视野,恰能交相照应、补充,实可谓珠联璧合之议。

随着新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新文学体系的渐次成熟为白话理论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语言资源,其中尤以促成新文学现代格局创立的《新青年》杂志最为切要。《新青年》最早刊发了以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风波》等为代表的现代白话小说和以“新青年”同人为主要撰稿者的随感录杂文,为新文学格局小说和散文文体的成熟奠定了基础。根据“文言一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语言变革方案,白话话语体系自然会从中汲取诸多营养。以鲁迅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例,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形式创作,在社会历

史变迁与白话语言革新的背景下显然暗藏心机。鲁迅用文言写成“识”，叙述作品成因及背景；正文则摘录狂人的白话体日记，颇多荒唐之言，意在言外，形成了双语共生、文白兼具的奇异文本形态。仔细分辨不难发现，文言部分的叙述是作者对正统古典文学的戏仿，无论是言语声调还是思想观念都难脱封建宗族制度和礼教教义的束缚。白话体日记则不仅在表达内容上自由抒发了“狂人”的亲身体验，还在文本形式上预示和加强着内容的真实性，完全不同于“瞒和骗”的文学，在戏仿与真实、文言与白话间的参差对照中寄予着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当“狂人”运用白话话语体系的词汇与逻辑方式写日记时不仅发现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还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呼声。思想内涵与语言形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完成了一种全新的、与文言话语截然不同的白话话语体系的创造。它依循现代理性逻辑，有着严谨的主、谓、

宾、定、状、补的语法结构，包含着全新的生活理念和人学思想。而一旦“狂人”病愈重返文言体系，便又无可奈何地陷入封建正统的规范之中，“赴某地候补”去了。可见，独特的生活语境和思想体系孕育相应的话语系统，反之亦然。白话理论的完善离不开繁荣的文学创作与具体的社会思潮流变。

经过“新青年”同人的理论倡导、修正与自我完善，白话话语系统在语用层面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的现代特征。在词汇方面，白话体系容纳了部分文言词汇又吸收了某些现代口语；在语法结构上，白话体系借鉴了古代白话文学、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长。它适应了时代要求，为语言思想性变革做好了准备。可以说，无论是“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观念衍生，还是“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的精神张扬，都是在白话语用层面之上达成的语言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契合，《新青年》杂志无疑对此功不可没。

参 考 文 献

- [1]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J]. 新青年, 1917, 2(5).
- [2]刘半农. 我之文学改良观[J]. 新青年, 1917, 3(3).
- [3]陈独秀. 通信·陈独秀致胡适[J]. 新青年, 1917, 3(3).
- [4]胡适. 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 [J]. 新青年, 1919, 6(5): 488-499.
- [5]钱玄同. 通信·钱玄同致陈独秀[J]. 新青年, 1917, 3(1).
- [6]钱玄同. 《尝试集》序[J]. 新青年, 1918, 4(2): 138-142.
- [7]曾毅. 通信·曾毅致陈独秀[J]. 新青年, 1917, 3(2).
- [8]林纾. 致蔡鹤卿太史书[N]. 公言报, 1919-03-18.
- [9]胡适. 通信·论小说及白话韵文[J]. 新青年, 1918, 4(1): 75-84.
- [10]傅斯年. 读者论坛·文言合一草议[J]. 新青年, 1918, 4(2): 185-189.
- [11]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J]. 新青年, 1917, 3(1).
- [12]陈独秀. 通信·陈独秀答曾毅[J]. 新青年, 1917, 3(2).